

民国时期清华所藏 外文版《资本论》评介

尹 昕 蒋耘中

摘 要:民国时期清华大学藏有3种外文版《资本论》: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第一个德文大众版和第一个日文全译本。这3种版本恰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苏联和东欧主导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事业之前出版的,是这一阶段的主流版本。这一阶段《资本论》的出版支持者和编译者因为不同的出版目的和学术偏好,往往选择了不同的母本和编译原则,从而形成与现今通行本不同的特色。从版本源流的角度考察这些版本,挖掘其文献传播史和编译史方面的价值,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问题。此外,以这3版《资本论》为代表的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反映了民国清华在外文藏书方面非常注意跟进学术前沿,对今天清华大学文科的学术文献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资本论》; 版本研究; 老清华; 考茨基; 高畠素之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10JZD003)

作者简介:尹昕,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084);蒋耘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以下简称老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老清华在人文社会科学类藏书、特别是外文藏书方面很有特点,且有一定数量。今天,图书馆一期建筑的玻璃库里还存放着3万余册老清华的外文藏书。其中有3套不同语种的《资本论》,分别是:第一个英文全译本(Karl Marx: *Capital*, 3Vol., translated by Ernest Unterman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06-1909),第一个德文大众版(Karl Marx: *Das Kapital*, Volksausgabe, hrsg. von Friedrich Engels, besorgt von Karl Kautsky unter Mitwirkung von Benedikt Kautsky,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olger, 1914-1929),以及第一个日文全译本(カール・マルクス著,フリードリヒ・エンゲルス編,高畠素之譯:《資本論》,东京:改造社,1927-1928)。这3套书是在国立清华大学时期入藏的,是那个年代《资本论》的主流版本,充分反映了老清华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外文藏书情况的特点。

这3套《资本论》恰好出版于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MEGA^①出版之前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众所周知,《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于1867年,距今正好150周年。这本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学术著作拥有几十种编译本。目前通行的版本要么是苏联和东德主导编译的标准版,要么是以标准本为母本的译本。^②这种情况是在上世纪30年代MEGA^①项目之后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

① MEGA^①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的德文简称,全称为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出版于1927-1935年。

② 以《资本论》第1卷为例,恩格斯最后校订出版的第4版(1890年)为现今通行本,也是现在几乎所有译本的标准母本。实际上,马克思亲自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有3版,包括德文第1版(1867年)、第2版(1872年)和法文版(1872-1875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修订出版的第1卷包括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以及英文版(1887年)。这6个版本有重要的差别,因而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不同版本的出版支持者和编译者因为不同的出版目的和学术偏好,往往选择不同的母本和编译原则,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国内鲜见对这一历史时期《资本论》出版史和版本比较的研究。随着新MEGA的出版,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将《资本论》看作是未完成的作品,因此,版本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亟待展开。而老清华所藏正好是这一时期的版本,本文将按照出版时间顺序介绍这3种《资本论》的历史背景、版本源流、地位与影响力。

一、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克尔版

1906—1909年,《资本论》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姗姗来迟。^①其出版商为著名的克尔(C. H. Kerr)出版公司,俗称克尔版。这套《资本论》共3册,棕红色的硬壳封皮,书脊上方是烫金的书名、卷册和作者。老清华保留下来的克尔版^②有3套之多,是馆藏最多、也是馆藏最早的《资本论》版本。大部分里面都盖有“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钢印,其中一本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章,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入藏的。

克尔版在英译本中有几个“最”。它是通行时间最长的英译本,几乎流行了半个多世纪,流通范围最广,直至今日,除了清华图书馆、燕京大学旧藏,在贺麟、张芝联等名家藏书中有这套书的踪影,在国外古董书市场上偶尔也还能见到;它也是最早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版社出版、最早由工会工人印刷的版本。其芝加哥的克尔公司相当于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党机关出版社,其印刷单位为芝加哥的印刷业联合工会(Allied Printing Trades Council)。

克尔版的出版史反映了马克思著作在英美不同的传播史。尽管马克思从1849年始直到去世都居住在伦敦,《资本论》也是在英国写成的,并且“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③但马克思的影响在英国进展缓慢。在革命实践方面,马克思与宪章运动的领袖决裂,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中并不大受欢迎。马克思对“第一国际”的贡献是在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后才广为人知,并且也是以负面的、暴力策划者的形象出现。在学术思想方面,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作为学者的马克思,仍然多持批评的态度。所以,马克思虽身在伦敦,并一直试图寻找英译者,但第1卷的英译本直到1887年才出版,^④离1867年德文首版已经过去20年,马克思也已离世。此后,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未能在英国出版。

同一时期,德裔社会主义者移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1850年后,大量德裔社会主义者,如左尔格等人,移民新大陆,形成重要的左翼力量。1878年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加重了这种情况。这些移民中很多人投身于翻译、出版和宣传马克思著作的事业中。克尔版的译者温特曼(E. Untermann, 1864—1956)就是其中一位。他从普鲁士移民美国后,参加了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成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左翼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编辑。除了《资本论》全3卷,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狄慈根、倍倍尔等人的作品。

另一方面,工人运动重心转移到美国刺激了对社会主义理论读物的需求。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一个低潮时期。“第一国际”总部被迫转移到美国。伴随大工业的发展,美国工人运动相对欧洲更为激进,“第一国际”美国分部的会员数增加很快,对社会主义理论读物的需求日益旺盛。以至于《资本论》英文初版有一半卖到了美国,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是在工人运动比较

① 在此之前,《资本论》已经有了俄文全译本(1872—1896年)和法文全译本(1872—1902年)。

② 此外,清华大学获得的海外赠书中还有3套克尔版《资本论》,分别来自于“服部文库”“科恩文库”和“爱泼斯坦文库”。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④ 1887年版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第1版,由穆尔(S. Moore)和艾威林(E. Aveling)翻译,恩格斯校订,桑南夏恩(Swan Sonnenschein)出版社出版于伦敦,也称“桑南夏恩”版。

活跃的芝加哥出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论》与工人运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本论》中有关“工作日”的部分(见第1卷第8章),对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对理论读物的需求。克尔出版社看到了这一点,以此为已任,出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策划了“社会主义经典文库”(Library of Socialist Classics)等一系列出版物,使马克思在美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同时也使克尔公司的标志——手持火炬的形象——也成为左翼出版物的标签。

从版本源流来看,克尔版以恩格斯版为母本,但又有所不同。第1卷是在1887年英文初版^②的基础上,将恩格斯德文第4版(1890年)的修订内容译成英文补充进来,这样新增的修订内容总计大约有10页的篇幅。另外还重新修订了脚注,卷末增加了参考文献目录和简单的名目索引。英文版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虽然是以恩格斯德文版为母本,但是,却采用了法文版的篇章结构,即8篇33章,而不是德文版的7篇25章,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后继的英译本中。克尔版第2卷和第3卷的母本分别是第2卷德文第2版(1893年)和第3卷德文第1版(1894年),这两个德文版都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由于马克思没有留下第2卷、第3卷的定稿,所以,恩格斯编辑的版本成了外译本唯一可选的母本。温特曼翻译第2卷、第3卷时在一个农场,无法查阅资料,所以,后两卷没能像第1卷那样对英文引文进行全面核对。^③

一百多年来,克尔版逐渐融合进新的英译本中,并未被历史淹没。在其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克尔版不断被再版,并在1936年被收入《现代文库》丛书(The Modern Library)。直至1950年代苏联“研究所版”^④出版前,克尔版都是最流行的英文全译本。实际上,莫斯科主持出版的“研究所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译本,其译文大量使用了克尔版的译文。它的进步之处在于利用了莫斯科所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使之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译本,并在苏联的影响力范围内替代了克尔版。真正的全新译本是1970年代由“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合作出版的,^⑤并由托派经济学家曼德尔(E. Mandel, 1923 - 1995)写了大篇幅的前言。尽管有了新译本,1990年代出版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资本论》卷次时,克尔版译文仍被大量采用,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

二、第一个大众版——考茨基版

1914—1929年,《资本论》第一个大众版^⑥在斯图加特和柏林出版,因为是考茨基父子所编辑,俗称考茨基大众版。我国早期也曾译作“考茨基国民版”。这套书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由党的机关出版单位——迪茨(Dietz)出版社出版的,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普及作用。第二国际破产后,曾一度

① 参见庚欣:《〈资本论〉在美国的传播》,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8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35—644页。

② 1887年英文初版是以德文第3版为母本,恩格斯校订英译文时,还使用了马克思生前为美国版准备的部分材料。

③ 在翻译1887年英文初版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Eleanor Marx Aveling, 1855 - 1898)对第1卷的英文引文进行过全面的核对。

④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3 Vo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5, 1957, 1959。

⑤ 参见Karl Marx,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and David Fernbac: *Capit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之所以要出新译本,两位译者认为现代英语的变化需要新的译文,并且随着对马克思的研究深入,以前为了照顾读者的理解能力而做的通俗化、简约化处理,显得没有必要了,可以恢复整个原貌了。

⑥ 所谓大众版,不同于节选版、改编版或解读版。大众版是保留原版的文字,但是,做了精细的校订,对印刷错误、笔误等予以改正,并配上前言、索引、附录等各种资料,以便大众学习的一种版本。

销声匿迹。老清华留下的这套书3卷4册,棕色硬皮带护角,装帧朴实,书后还有不少1930年代的借阅记录。

考茨基大众版的推出,其直接历史背景是马克思著作版权保护的失效。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根据德国的著作版权法,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将失效。也就是说,各种出版社可以任意翻印和再版马克思的著作了。^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1911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推出了“维也纳编辑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出版方案。其中包括了一个面向大众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事实上,由于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全集的出版方案后来被搁置。而大众版《资本论》因为具有巨大的政治、宣传意义,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大众版,理所当然落到当时处于“第二国际”理论权威地位的考茨基(K. Kautsky, 1854-1938)肩上。

虽然后来被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但考茨基早期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不容忽视。考茨基1886年所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传播很广,被译成多种文字,仅解放前出的中译本就有7种之多,影响了几代进步青年。以至很多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考茨基的阐释著作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著。即便后来成为论敌的列宁也认为自己年轻时受教于考茨基的著作。此外,考茨基跟恩格斯学过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有资格接触《资本论》的原始手稿。因此,考茨基是大众版《资本论》的最佳人选。他的儿子(B. Kautsky)也成为大众版第2卷、第3卷的编者。

除了考茨基父子,大众版背后还有另一位贡献者——梁赞诺夫(N. Rjasanoff, 1870-1938)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鼻祖。他当时在欧洲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研究、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大众版筹划之初,梁赞诺夫就与考茨基交流了编辑原则,使得《资本论》第一次加了索引,由他亲自编写。索引由引用著作目录、人名索引、名目索引组成,梁赞诺夫还为此写了6页的索引序言。不过考茨基在前言中提醒读者,不要老想借助索引“在点心中找葡萄干”吃,应该花力气通读全书。另外,梁赞诺夫还建议专门写一个导言,说明《资本论》对于科学和工人运动的意义,并使注释更加丰富;但是,这些考茨基并没有采纳,只是将外文标记与引文都进行了翻译,以增加可读性。

考茨基版的母本非常独特,有一些在其他版本中看不到的内容。第1卷以马克思修订的德文第2版为母本,这在20世纪出版的版本中是非常少见的。在第2版的基础上,考茨基除了将一部分恩格斯在第3、第4版中的校订考虑进来,还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在第1版、第2版自用本上标注的修改和补充,这些是被恩格斯放弃的。另一方面是增加了一些马克思标注的、但被恩格斯放弃的法文版的内容。^②由于法文版的通俗化特点正符合大众版的定位,所以,甚至在马克思没有标注的地方,考茨基也译成德文放进了大众版。这几个做法使得考茨基大众版的内容独具特色。

考茨基版出版后,被看作普及《资本论》的典范,多次再版,成为各种译本的母本,例如,《资本论》第一个中译本——陈启修版(1930年)即是采用考茨基版作为母本的,^③还特地将考茨基写的序言译出来放在前面。侯外庐、王思华版(1932年)也参考了考茨基版。在日本,著名的河上肇和宫川实的译本、高岛版的译本都采用了考茨基版。日本甚至还专门出过一个考茨基版的对照译本。

大众版的命运随着考茨基的地位的变化很快被逆转。众所周知,考茨基由“第二国际”领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其编辑的大众版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史》等书被批判为断章取义、有意歪曲。1932年,莫斯科马列研究院出了一个新的大众版,一般被称作“研究院大众版”。因由院长阿多拉茨

① 因为《资本论》第2、3卷是恩格斯编辑出版的,所以,考茨基大众版的第2、第3卷是在1925年恩格斯的著作权保护失效以后出版的,分别是在1926年和1929年。

②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法文版自用本上标注了他想收入德文第3版的内容,但因病未能亲自出版第3版。第3版是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恩格斯并未收入全部的标注。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陈启修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30年。在“译者例言”中写明了“翻译的原本是考茨基国民版的第8版(1928年)”。

基负责编辑,所以,也常被称作“阿多拉茨基版”。这个大众版即是针对考茨基版所出。这种情况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从此,考茨基大众版被“阿多拉茨基版”取代,鲜有再版。所以,这套书现今也不多见了。

近年,考茨基版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新MEGA)第二部门中《资本论》手稿部分的出版和研究,恩格斯的编辑稿和刊行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差异被呈现出来,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考茨基在大众版序言中讨论评价了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是最早公开提出并评价这一问题的,并且也是最早提出应该“按照原样发表马克思的全部手稿”^①的人。实际上,对考茨基版的再研究,有利于客观评价考茨基对普及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对于《资本论》的传播史,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

三、第一个日文全译本——高畠版

《资本论》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出版于1920年代,因为译者是高畠素之,也俗称高畠版。高畠版既是日本第一个《资本论》全译本,也是亚洲第一个全译本。因为地缘关系,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日译文对中译文影响很大,早期中译本大多借鉴了日译本。另外,与前述的克尔版和考茨基版不同,高畠版没有左翼政党或工会的背景,高畠本人甚至在翻译《资本论》的10年中,由一个社会主义者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去支持法西斯。这两点使得该版本非常重要,值得玩味。

日本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东亚传播的始发地。早在19世纪末,日本人就开始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罢工走向高潮,工人运动逐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到了1920年代,出现了一批经典文献的日译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时间上比中译本早了10年以上。^②同时期,日本学者还开始在欧洲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和文献,这一历史性的工作只是略晚于苏联的梁赞诺夫,而中国是到近些年才开始。

日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入和传播的重要中介。很多早期进步知识分子都有留日经历,除了大家熟知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资本论》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启修(又名陈豹隐)就是河上肇的弟子,19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开课,按照《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的另一位译者王亚南先生也曾两次东渡日本,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

高畠素之就是这些日本学者中的一位,他的影响力不如河上肇那样大,后期发生了思想上的大转向,所以国内对他的研究不多见。但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史中常能看到他的名字。最早发表于《晨报副刊》的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当时译作柯祖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就是陈溥贤根据高畠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的。早在1920年代初,高畠著的《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学说概要》就分别由中共创始人李达、施复亮(原名施存统)翻译成中文。^③高畠的《地租思想史》在1931年由王亚南翻译成中文。^④

高畠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3卷《资本论》,这是第一个日文全译本,也是战前唯一一个全译本。

① Karl Marx,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Engels, Besorgt von Karl Kautsky unter Mitwirkung von Benedikt Kautsky: *Das Kapital, Zweiter Band: Der Z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Berlin: J. H. W. Dietz Nachfolger, G. m. b. H., 1926, S. XI.

② 参见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③ 参见高畠素之:《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北京:中华书局,1921年;高畠素之:《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④ 参见高畠素之:《地租思想史》,王亚南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

分为10册,收在大镫阁版《马克思全集》^①里。第1卷出版于1920—1921年,之后第3卷出版于1921—1922年。因为1923年关东大地震大镫阁被毁,第2卷的后两册在第二年改由而立社出版。

因为太过直译,高畠对自己的初版并不满意,为了使译文更加通俗化、简洁化,高畠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两次全面修订。第一次是1925—1926年,译文有较大的改动,修订了旧版的错译、错排,同时由10册本改为4册本。正好之前的纸型在地震中被毁,新版改由新潮社出版。第二次是1927—1928年,高畠又在新潮社版的基础上继续修订,吸收了小泉信三和堺利彦等人对译文的意见,最终由改造社出版了定本。最终定本面世的8个月后,高畠就积劳成疾,抱病身亡了。

老清华入藏的就是这部改造社版的定本,棕红色的硬皮本,共3卷5册。在1920年代,日本出版业为应对地震后的萧条,开始尝试“元本”(一日元一本)以求生存,成为后来的一种经典模式。而这套书正是这种“元本”,以预约的方式发售的,发行量据说达到15万册,非常可观。在国家图书馆和燕京大学旧藏中也有这个版本。

与高畠版同时代的还有其他节译本。高畠刚开始翻译时,就出了松浦要、生田长江等人的节译本,高畠的翻译工作受到很多质疑。但最后,高畠的译文质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稍晚的河上肇与宫川实的译本质量很高,但第1卷未出完便中断了。所以高畠的译本成了日本战前唯一一个全译本,直到约20年后才有新的全译本。高畠为此付出了十年的时间,据说其身下的坐垫都烂掉了。一开始第2卷的译者另有其人,后半途而废,由高畠接手,这也是第2卷最晚出版的原因。

从版本源流关系来说,高畠版的母本是德文第6版(1909年),^②并参考了英译本。在两次修订时参考了考茨基大众版。一方面是考茨基版注重通俗化,正符合高畠修订工作的目标。另一方面高畠对《资本论》的理解与考茨基有很大关系。他早年翻译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时,就开始琢磨新术语的翻译,后来用到了《资本论》的翻译中。高畠版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侯外庐、王思华版和郭大力、王亚南版^③《资本论》在翻译时就参考了高畠的译文。鲜为人知的是,郭沫若也曾想翻译《资本论》,他评价高畠说如能为译《资本论》而死,也算一种光荣的死。1928年他在上海读完了第1卷,读的就是从内山书店买的高畠版。^④

日文版《资本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译本多,二是注重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别。在高畠之后,还有3种全译本,译者分别是长谷部文雄、向坂逸郎和冈崎次郎。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翻译的,具有不同的翻译风格。并且这些译本选择了不同的德文母本,除了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版,还有考茨基版、阿多拉茨基版等,各具特色,使得研究者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与中苏的统一译本、大家都使用通行本的情况非常不同。另外,很多译本还出了普及版与周年纪念版,“元本”与精装本等等多种形式,推动了《资本论》的普及。第二,日文版非常注意对马克思亲自出版的——不同于恩格斯修订出版的——版本的研究。日本对于德文第1、第2版和法文版的翻译远远早于中国,出版过多种译本及其研究文献,其目的就是要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工作区分开来。仅从日译本之多、之丰富即可窥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的兴盛。这种兴盛在远离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① 高畠版最初作为大镫阁版《马克思全集》的第1—9卷出版,共10册,其中第1册由福田德三做了校注。

② 这个德文第6版实际是恩格斯最终修订的德文版的再版,即第1卷第4版、第2卷第2版和第3卷第1版的再版。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第765页。译者后记中讲到参考了一种英文全译本和一种日文全译本。按照出版时间,这两种全译本应该分别是克尔版和高畠版。

④ 参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58—260页。

四、小 结

今天来看,《资本论》的早期译本和早期大众版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过时,但重温其出版的历史背景,能发现多数《资本论》版本后面都有左翼政党的推动,它们与国际共运史的脉动相连。其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学术质量,也取决于背后编译者的政治命运。在马克思主义未占主流意识形态时,《资本论》的版本源流较为复杂,并且影响了早期的中译本。这是在解决至今仍有争议的重要术语的翻译等问题时不能忽视的。

20 世纪初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其著作、手稿被搜集、整理和公开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与国外图书馆相比,老清华虽然错过了入藏 19 世纪出版的一些原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但是,在 20 世纪初绝不落后于时代。就《资本论》来说,根据清华图书馆最早的“新书入藏登记簿”,前述英、德、日 3 种全译本都是在 1930 年前后入藏的。同时期入藏的还包括一种英译本——保罗版,^①一种非常罕见的法文版《剩余价值学说史》。^②这几乎囊括了当时新出版的所有外文版《资本论》版本。此外,老清华时期还收藏有一些相当贵重并且罕见的原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例如,F. 梅林编辑的 3 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选(1841—1850)》(1923 年版),^③这是著名的四大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之一。再如,梁赞诺夫编辑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④(1924—1930 年版),首次以原文出版了几种重要文献。更为罕见的是梁赞诺夫编辑的 *MEGA*^⑤,共 12 卷 13 册。这套书是新 *MEGA* 的前身,国内已鲜见馆藏。书后大量的借阅记录,更是国内绝无仅有的。

究其原因,首先,老清华对于外文藏书从整体上是非常重视的。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清华改革为新制大学,图书购置经费、西文书刊体量、西文书刊借阅量都大幅度提升,西文图书借阅量再次超过了中文图书。^⑥当时,西文书是以杜威分类法编目,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大多属于“经济学”分类中的两个子类:“社会主义”和“劳工经济学”。今天保留下来的解放前的这两类西文书约有 500 多种,大多是在出版后不久就入藏的,可见当时的外文文献保障方面非常注意跟进学术前沿。

另一方面,这些专业性非常强的外文藏书,也从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老清华的存在。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比较注重的是与革命运动有关的传播。这方面北京大学无疑是一个重镇。实际上,这种方式所涉及的红色文献多是中文的小册子。而像外文版《资本论》和 *MEGA*^⑦这样的专业书籍是学理研究才会需要的。老清华在 20 世纪 30 年代能够收藏这么多的《资本论》的外文版,且被大量借阅,恰恰反映了一个被忽视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知识圈的传播,并且清华在这种传播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 参见 Karl Marx, edited by Eden & Cedar Paul: *Capit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8. 保罗版只译了第 1 卷。

② 参见 Karl Marx, publiée par Karl Kautsky, traduit par J. Molitor: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Paris: Alfred Costes, Éditeur, 1924 - 1925. 译者 J. Molitor 名不见经传,但此人同时翻译了《资本论》全 3 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一系列著作,几乎涵盖了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③ 参见 F. Mehring (Hrs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41 bis 1850)*, 3 Bd, vierte Auflage, Berlin und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23. 比较有趣的是,这套书在 1902 年初版时为 4 卷本,名字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到 1923 年再版时才将拉萨尔的部分删去。这是因为编者梅林倾向拉萨尔的立场造成的。

④ 参见 N. Rjasanoff (Hrsg.), *Marx-Engels-Archiv*, 2 Bd,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sgesellschaft M. B. H., 1924 - 1930.

⑤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1 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55—463 页。